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亡灵祭坛】	田钺和喻瑞芬	王友琴
【广阔天地】	文革中的青年思潮	印红标
【亲历者言】	毛泽东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浙江的亲信	徐景贤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亡灵祭坛】

田钺和喻瑞芬

• 王友琴 •

田钺，男，北京第106中学初二学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数学教员田钦的弟弟。1966年8月19日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指控“冒充红卫兵”，抓到学校里，在一间教室中被毒打致死。时年15岁。田钺所在的北京第106中学位于鼓楼和德胜门之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中学。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所谓“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可以当红卫兵，他们还把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叫做“狗崽子”。另外，还有所谓“灰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和“黑五类”一样也不得参加红卫兵。1966年8月，红卫兵狂热传播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特别强调成员家庭出身的先天性条件，是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的最大特色之一。田钺并不是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是“职员”出身，属于所谓“灰五类”，他的父亲在人民医院财务科任会计。父亲大学毕业那年正逢日本投降，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成为“历史问题”，文革中不准许他再做会计。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掀起高潮。田钺在一个集会上，曾经发言批评上述“对联”和红卫兵的打人行为，因此在106中学遭到关押和殴打。第二天，8月19日，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指控他“冒充”该校绰号为“汤二七”的红卫兵领导人汤晋平，以此为由，将他从106中学抓到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在学校3楼的一间教室里毒打田钺，田钺被打得头部肿大，昏迷不醒。红卫兵用冷水浇他不起作用。后来有人去106中学找来革委会的一个委员，到师院附中来制止殴打。田钺被送医院，已经没有抢救的余地。

据说田钺死前要求喝水，喝水后就死了。有人说不应该喝水，打成重伤后喝水就会马上死。但是医生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喝水只可能对人体有帮助。田钺这种情况，就是被打死的。

田钺的哥哥田钦，是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数学老师。当时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因为他被当作“有问题”的老师，外出必须向红卫兵请假。弟弟被抓到学校里打死，他并不知道。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一名干部田遇安出面通知田钺的父亲处理尸体。没有验尸报告。没有保留骨灰。

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和居民。用“冒充红卫兵”的罪名就可以打死一个人，从中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的权力有多大，他们的行为有多残酷。

田钺在家排行老三，有哥哥、姐姐和妹妹。他死后，家人一直没有敢告诉母亲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他们只说他失踪了，下落不明。他的父亲心里一直很难过，六十多岁就去世了。

一位该校当年的学生告诉笔者，他在1967年1月和田钺的哥哥田钦谈过田钺的死，田钦非常难过。但是他们无法为田钺之死寻求正义。另外这位被访者还说，当时打人最厉害的一个红卫兵，作为报应，1990年代中和情妇一起在什么地方中煤气，被煤气熏死了。

笔者乍听觉得奇怪。被煤气熏死就是一个意外事故，哪里谈得上是对他在1966年做的坏事的惩罚呢？对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杀戮，至今没有审判，也没有惩罚。但是有这样的故事在流传，也许说明人们内心还是敬畏着“有罪当罚”的古训，希望文革中的罪恶多少得到惩罚。

喻瑞芬，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下旬在学校里被红卫兵学生毒打并遭到沸水浇烫，死后还遭鞭尸，时年50来岁。

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和老师已经不记得喻瑞芬是哪一天被打死的，但是记得她死在1966年8月下旬，即红卫兵打人最凶的时候。调查多年后，有一位受访者说，他记得是8月27日。

喻瑞芬是生物教员，毕业于北平（北京）的中国大学生物系。师院附中的3个生物教员在1957年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喻瑞芬因此被“下放劳动”，回到学校后也没有再让她上课，只让她管理学校的生物园地和生物标本等等。

喻瑞芬被打死的那天早上，红卫兵把她从家里抓到学校，她被剃了光头。师范学院附中的老教师比较多，当时已经有50多名老师和职员被送入学校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先后遭到殴打和侮辱。

一群红卫兵涌到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喻瑞芬缩到墙角。红卫兵过去拉她打她。她摔倒在地上，有红卫兵就提起她的两条腿，把她从办公室里拖出来，拖过楼道，拖到楼门口。

生物教研组办公室在一楼，楼门口有一个水泥台阶。一名学生目击者说，红卫兵学生倒提着喻瑞芬的两条腿下台阶的时候，她的头就在一层层水泥台阶上咯噔咯噔地碰撞。

另一名教师目击者说，喻瑞芬被拖到楼外操场上后，红卫兵在操场上拉她转圈，边转边打，不久喻瑞芬就昏迷了。有一个红卫兵到学校开水房提来一桶开水，浇在她的头上、脸上和身上。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折磨，她死了。

教务处的一位职员当时也在“专政队”里，学校的人事干部叫她去查喻瑞芬的家庭地址，说喻瑞芬已经被打死了，要通知她的家人。喻瑞芬的丈夫来了学校。但是没有让他领尸体。红卫兵学生把喻瑞芬的尸体放在学校的后操场上。天气很热，苍蝇很快就飞到尸体上面。有人拿来一个草席，把尸体盖上。

有红卫兵学生把“专政队”的人召集起来，指着喻瑞芬的尸体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然后拿着皮鞭命令“专政队”里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打喻瑞芬的尸体。喻瑞芬的身体已经被沸水浇烫过，一打就皮肉破碎了。那位查找她家地址通知她家人的职员，曾在喻瑞芬死后到她家门外看过。她的家被抄了，门敞开着，没有人管。她始终不知道喻瑞芬的丈夫和女儿去了哪里。

在师院附中被打的老师，并不只是喻瑞芬一个人。校长艾友兰，被打得都认不出来了，头肿得像大猪头，头上脸上被打出来的伤口都裂开着。他被关在学校里面。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召集“专政队”的“牛鬼蛇神”到艾校长被关的地方去参观他，拿他那惨不忍睹的模样威吓其他人。

师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赵幼侠，被剃了“阴阳头”，被强迫吃虫子“臭大姐”。她住在师范学院里面，和附中对门，红卫兵命令她天天爬着进校门，后来她有了精神病，一走到那个地方就开始爬。

师院附中的校医，是一名50多岁的独身女士。有一天，红卫兵把她和教导主任两个人捆在一起，在宿舍里，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宿舍里盘旋着他们的惨叫声，悲惨恐怖。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到学校周围的农村打人。高三的一个班的红卫兵，在一天夜里就打死了好几个“地主”“富农”，打人过后，还回到学校炫耀他们的残酷。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到老师的家里抄家，任意拿走他们的东西。教职员的家属也被迫害，教务员李庚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打，她的爷爷留下的一箱字画被没收，她的母亲被当作“地主”驱逐到河南农村，不久死在那里；她的父亲70多岁，被红卫兵绑在床上殴打，她父亲服毒自杀，未死却变成了聋哑人。1974年，李庚寅在美国的弟弟从美国打电话问候父母，虽然得到公安局的准许可以通话，但是父亲已经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她不敢告诉弟弟母亲是被驱逐到河南农村而死在那里的，谎称母亲去了农村是因为在城里只能火葬，在乡下可以土葬。

当时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有两个红卫兵组织，先成立的叫“红卫兵”，后成立的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都很暴力。在1966年8月，在所谓的“红八月”中，一派打死了田钺，另一派打死了生物老师喻瑞芬。据一位当时该校的非红卫兵学生说，文革后，他遇到本校的红卫兵同学，某人笑着说：“那时打地主婆，打打打，哎哟哟叫唤，打半天，也不死”。他听了直害怕。

□ 摘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田钺，王友琴添加了新的采访内容——原编者注

〔原编者按：2004年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记录的两位受难者，喻瑞芬老师和田钺，2014年在他们的受难地首师大附中，第一次被公开提及。马晓力在母校的教师节大会上抚今追昔，提议为两位受难者默哀，唤醒老校友们关于文革的记忆，她说，我们用拱卒的精神反思文革，拒绝遗忘。〕

◇ 附：默哀与道歉——马晓力在教师节暨首师大附中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老师、校长和各位领导，亲爱的校友、同学们：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教师节，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校友，向可敬可爱的老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对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表达深深的敬意。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伟大而圣洁的崇高职业。但是在48年前，老师们却首当其冲受到突如其来的猛烈冲击，残酷以至血腥，留下了巨大的伤痛。教师一夜之间被冠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人，抬不起头来。在他们教过的学生们的批斗、恫吓、打骂和凌辱下，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煎熬，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那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极为荒唐恐怖的岁月。

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教训，不知反思，就不可能进步；不学会呕吐糟粕，身心也不可能健康和成熟。48年过去了，请允许我代表自己，代表与我有共识的当年老三届的学生，向在文革中被我们伤害过的老师和所有的教职员工，真诚地道歉！请接受我们这份来得太迟的道歉！

我们还要向在那场灾难中不幸被残暴致死的喻瑞芬老师、田钦老师的弟弟田钺致以沉痛的默哀！（请大家起立默哀一分钟，默哀毕。）

这份道歉实在来的太晚了！比起老师们当年受到的伤害太微不足道了！也许有人会以文革发动者的责任来开脱自己，但是正视与批评文革始作俑者的错误，不能取代对我们自己灵魂的拷问。也许我们很多人当年并没有过激行为，甚至反对那样野蛮地对待老师，但作为文革的响应者、参与者，我们亲历、目睹了那血腥罪恶、惨绝人寰的一幕，至少缺乏足够的勇气和理性保护好我们的老师、校长，还有一些人成了疯狂的打手。尽管我们没有为那场灾难承担全部责任的资格，但今天还不说道歉，将永远背负着良心的不安与谴责。

我们有责任反思自己，反思文革作为意识形态刻在我们身上的烙印。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左，非黑即白，以阶级斗争为纲，满眼皆是阶级敌人的斗争哲学及思维方式；那种排除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恶劣行径；那种盲目崇拜、迷信救世主的情结；那种狂妄的法西斯式的“血统论”；无法无天“破四旧”、肆意毁坏传统文化的愚蠢冲动；还有动辄出口伤人，满嘴国骂，肆意侮辱同学、老师、朋友和所谓“阶级敌人”，崇尚武斗，皮带乱抡的暴民式野蛮，等等等等。

我想说的是，过去我们缺乏这种觉悟，今天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倾吐心声。在此我还要特别讲讲，我很佩服德意志整个民族对待法西斯纳粹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思态度。德国是个哲学家辈出、崇尚理性的国度，连他们战后出生的孩子都懂得质疑，孩子们逼问自己的父母：你参加过纳粹没有？你杀过人吗？二战以后他们几乎全民族都在反思，勃兰特总理（1985年）的惊世一跪，不仅没有使德国受辱和丧失尊严，反而使整个德意志民族从此站起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佩。今天我们用拱卒精神推动反思文革，拒绝遗忘，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解，文明的进步。

今天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却被我搞得纠结、沉重。我很抱歉。为了化解这个尴尬，我为老师们带来一组草原恋合唱团（马晓力为合唱团团长——编者注）前不久在拉脱维亚里加第八届国际合唱节荣获金奖第一的一组节目，《草原印象》。

谢谢老师、同学们！祝教师节快乐！祝老师们健康长寿！

□ 原载《熊窝》网站

~~~~~  
【广阔天地】

文革中的青年思潮

• 印红标 •

〔编者按：“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至今已发生51年了。虽然这对整个国家形成灾难性的冲击，对整个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居然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深刻的共识，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彻底地反思、更没有揭示其事件发生真正的政治与文化的根源。并且，还有不少人不仅不认为其对人类文明的浩劫与反动、对人性人道的扭曲与羞辱，反而还加以肯定和称颂，认为它还是中国进步的一种别无选择。不久前竟然还在几个省市发生了局部的文革回潮，死灰复燃。这样的误区或混淆必须彻底澄清，这样的毒化现象必须再次拨乱反正。2015年间，我们约请了中外数位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一次专题系列访谈。以他们的见闻和认识，从更多不同角度可为今天的青年读者揭开“文革”运动的面相和迷雾，让更多人学会从历史的悲剧中醒悟，从而走向常识和理性，为自己，也为未来可以健康发展的中国。〕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印红标教授来跟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印红标曾经就读于吉林大学跟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所作的论文就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的博士论文扩充以后成为一本专题著作，在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业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编注）印红标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大家知道，北京四中是一座云集了高干子弟，甚至国家领导人子弟的学校，关于北京四中的文化革命，就很值得一说。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书，里面就有印红标的文章。所以我想说的是，印红标先生，北京四中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四中的学生，当时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是怎么想的？暴风骤雨汹涌而来的文化革命，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跟着走。在一个中学里面，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差不多没有什么话语权，跟着哥哥们走就是了，因为那是个男校。我的基本感觉就是总是跟不上。文化革命以前基本听老师的，老师就被批判。然后就跟着工作组走，工作组就被批判。那再往前还想走，红卫兵不要我们，我们出身不够好，就算想参加革命，人家不要。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血统论又可以了，出身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努力就行，那我们就跟着走。可是我们这种年龄加上我本身偏爱自然科学，我不太会写文章，所以文化革命那时候，我大多数的情况是看。最多是听那些年纪大的那些高官子弟的学生的指挥，帮忙发传单之类的。至于传单上写什么跟我关系不大，那时候就是希望自己能做点事。

徐：那我就想问你，这本重要的关于文革的学术著作，其实谈的是文革中间的民间思潮，就是那些参加文革的年轻人，他们对于文化革命、对于未来、对于命运的思考。但是，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文化革命是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至高无上的，怎么还有民间思想？那你首先跟我解释一下，文化革命有哪些学生他们在自己思考？

印：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文化革命之前所有思想都是要求一致的。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下面教育部，到大学、中学，这是一个统一的要求。所有人的思想是要求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通过老师，通过报纸，都把它变成一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特点就

是，毛泽东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就把以前的行政干部，宣传干部，老师和后来的工作组给放在一边了，给了学生一个自己讨论的空间。当然这个空间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护毛泽东，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拥护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但是在这个大的范围之中，还会有一定的讨论的空间。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都是感觉自己跟着毛泽东走，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这一部分学生和那一部分学生的处境不一样，比如家庭出身不一样，或许跟学校的领导、跟工作组的关系有远有近，于是就造成了一些差别。对我们中学生来讲，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以一些干部子弟为首的红卫兵，他们就特别强调家庭出身。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么这样一来，就把学生从政治上分开了。那么出身不好被叫做狗崽子的人，或者出身在中间，也说不上不好也说不上好的，在旁边看的人，他会感觉到被冷落了。于是他们就要争取，他们也有参加文化革命的权利。我最近看到有些人写文章，就是那些属于造反派写的文章说，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曾经争取平等权利。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那个时候的平等权利是，你能跟毛主席走、我也能跟毛主席走这样的权利。就大多数来讲，思想深度还不够。

徐：那照你的说法，我就会有一个感悟，思想在极其禁锢和高度统一的时候，其实思想本身还是有自己的活力，还是会有自己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跟自己的利益是有关系的。但是那我还是要请教你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说文化革命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很厉害的时代，那这种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比方据你刚才的例子，以出身为例，就是双方的东西都跟官方不是完全一致的，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血统论观点，他具体的主张有多么严重？反抗这种思想又是怎么回事？

印：血统论是当时在中学生里面派别划分第一位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只要知道这个人的父亲母亲是怎样，比如说是一个教师，或者是一个工程师，你大概可以猜到他是造反派一边的。如果是一个领导干部子弟，可能就是红卫兵，或者老红卫兵，或者是保守派。

徐：那当初分红五类、黑五类，具体又是怎么回事？把同学分开了，有哪些理论在支持这种说法？你具体就说一下黑五类是什么，红五类是什么。

印：所谓红五类是指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这五类。但是这五类在中国的大城市，或者像北京、上海这样直辖市里面，最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子弟。因为后面三个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基本上是领导干部子弟。因为普通军人是不可能上有中学的孩子的，只有军官才有。但是在大城市里面，像上海还是有一些工人子弟的。在北京，本来产业工人就很少，工人子弟很少。贫下中农又主要不是在城市，所以在红五类子弟这样一个概念下，主要是领导干部子弟作为骨干。他们在谋求自己特殊的意义。就是说革命要他们来主导，他们是当然的接班人。本身就自来红，就是说生下来就是红。所谓黑五类，他们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分子，还有加一个资本家，就是这样五类，这五个都被说成剥削阶级。但实际上，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因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财产所有地位造成的。而坏分子可能是因为一些不良行为，按当时的标准是不合男女关系，不正常关系。那反革命完全就是政治的，旧政权里面跟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这样一些人，那都是受到批判的，而且前面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对不起，黑五类是‘地富反坏右’，没有资本家，右是右派分子。这五个加上知识分子是没有公民权利的。在文化革命之前，就已经在讲阶级路线了。文化革命中有一些干部子弟，把这个推到极端。对当时的学生来讲，在一个个人崇拜的环境下大家都要跟毛泽东走。但是到每个人，我观察到态度有所不同。就是说，如果中央的某一个决策，或者某一个口号对他自己有好处，或者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他就会非常积极。如果不太容易理解，他就会慢几步或者有些犹豫。如果完全地处在必须和自己进行自我批判这样的立场的话，那么就会很被动。一个运动来了，它有积极的，中间的，被动

的。下一次新的运动来了以后，还会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当后来允许他们自己成立组织的时候，不同立场的人慢慢就分化了。

徐：刚才你讲了文化革命运动初期自发的思潮主要是根据家庭情况分成的，主要是血统论，以支持血统论还是批判血统论为中心的思想分化的。更重要的是，对文化革命本身，他们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印：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所说的由于家庭关系引起学生之间的派别分化，这主要是在中学。而在大学主要是因为工作组或者党委，具体说就是文化革命最开始的50天，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以及文化革命最开始的四个月时间中，当权派的态度。当权派在有些学校是工作组，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原来的校党委推倒了，然后来了工作组。有的地方还是原来的党委。那么在大学，支持维护文化革命前四个月的政治权威的，就是保守派。批判这个或者挑战文化革命前两个月或者前四个月的政治权威的就是造反派。至于说不同派别对文化革命的理解，老红卫兵派就是干部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和保守的这一派，维护平等的那一派。他们把文化革命理解为文化派的革命，是批知识分子，批老师，批校长，批文学家，批各种各样的教授，是这样一个革命。而造反派就认为，他比较能接受毛泽东的批判走资派，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观点。他们接受文化革命，是要批判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我们可以注意到走资派这个词的全称，就知道它的意义了。它的全称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在造反派看来，这也是他们接受毛泽东的观点，也就是党内的，不是共产党员是不要批的；不是主要的对象，不当权的，不是领导人的不要批判，所以就是批党政领导里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知道他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呢？就放手让群众揭发，看看他到底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来，整个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群人都受到了批判。

徐：我根据你刚才的介绍，当初虽然学生或者群众组织的成员非常活跃，自己动脑筋思考问题。但现在来看，无非也是在当初划定的范围内进行思考。据你的研究，有没有突破当初的思想框框？对这个社会制度，社会弊病，有没有更根本性突破性的思考？

印：这种思考是有的。但是出了这个圈就要受到批判和打击。一个就是遇罗克对于血统论的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像多数造反派认为的不应该讲血统论，应该回到共产党传统的做法，重在政治表现，也要看出身。他认为一切应该由自己努力，在自己努力之外带来的东西，都不应该作为衡量是不是革命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他这个更加平等，但是这样一来就出圈了，出了造反的范围了。还有更加突出的是1967年和1968年湖南省无联的长沙第一中学的杨小凯，他后来改名字叫杨曦光（编者注：这里是个口误。原名是杨曦光，后改名为杨小凯）。他有这样的观点，他把文化革命解释成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压迫的社会革命。我们可以看到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他们讲的是文化界的革命。造反派讲的是政治的革命，是党内斗争。而杨曦光他们提出社会革命，这真正像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势力一样，他们认为文化革命应该是反对官僚的革命，原因是由官僚的压迫引起的。所以文化革命，不是一个罢官革命或者一个揪人的革命，把这个人罢官下去了，把那个人扶起来，这个领导下去，那个领导起来。他说要改变这个关系，要建立一个没有官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社，而这个公社就像巴黎公社一样，领导权力由人民选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

徐：刚才印红标教授介绍的杨曦光我也非常熟悉。他在文化革命时期写了一篇震撼中国的大字报叫《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从题目就能看出来年轻人当时的气魄。他为了这件事被关在监牢里，但他在监牢里上了一个十年最好的大学。因为监牢里他周围的人都是很有学问的长辈，教他英语，教他数学，教他历史。后来他出来以后，到美国去留学，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他是当初被公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对中国的经济

体制改革跟中国民主宪政的前途和命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的论证。但是很可惜的是，他前几年因为癌症死掉了。杨小凯当然是中国民间思想里最杰出的代表。那还有别的吗？听说在广州还有李一哲的大字报，那是怎么回事？

印：李一哲的大字报已经到了文化革命后期，群众性的大运动结束。文化大革命应该至少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前三年，前三年群众的造反运动，下级批判上级，学生批判老师，这样一个运动差不多将近三年。再往后的七年间就不是这种方式了，后面七年的情况就跟文化革命之前的情况比较接近，都是按照党政体系布置下来的，很少有群众以下犯上的这样的造反运动。李一哲的大字报1974年贴出来的，他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我觉得应该介绍一下李一哲的情况。李一哲有一个学习探讨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小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四个人是李正天，王希哲，陈一阳还有郭鸿志。那么最后他们决定联合写大字报的时候，署名最开始只有李正天和王希哲，同时他们要考虑到郭鸿志当时已经40多岁，担心被别人说是幕后黑手，所以他们就写上“李一哲”，这个“一”我们去争取陈一阳意见，说这个“一”就是陈一阳，如果他不同意的话，这个“一”就是一杠。

徐：他们的大字报对于中国当时的现实跟社会制度批判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具体的主张？

印：我想他们主要有这样几个层次。主要是林彪事件出来以后，他们批判的想法更强烈了。在中国，在多数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是造反派逐渐发展起来压倒保守派。但是在广东省和广西省，造反派一直受压制，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是黄永胜，他背靠林彪，压制造反派。在林彪倒了以后，李一哲有了机会来批判对群众的压制，批判文化革命中后期的作法。他们的批判有几个层次。第一，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批判林彪等人的社会基础。李一哲的大字报提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林彪这些人，他们有很多裙带关系，个人和家族的关系，像林立果，大学刚出来马上成为空军作战部的副部长，权力非常之大，这是不正常的事。所以李一哲认为特权阶层是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在政策批判层面，他们认为批判林彪应该主要批判极左，批判极左的政策，恢复务实的政策。他们对党内的务实政策表示支持，比如在工人工资之外的奖金，他们认为应该有奖金，并且对当时农村的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也进行了抨击。另外认为在文化政策上也太左了。

第三，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论述最重要，他们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既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超越了文革的局限。首先他们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权力的监督。他们认为应该保障群众对领导监督的权利，同时他们又超越了文化革命大民主的概念。他们提出，应当允许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和反对派在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下公开存在。他们提出这一点和他们的经历有关系。李正天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大学生，文化革命中是造反派，后来他感觉到林彪的很多说法很过分，提出质疑，结果被人告发，被抓起来送去强制劳动。后来林彪倒台，他又被放出来，没有事情了。所以他们想到，当初如果允许批评林彪的意见存在的话，那么全国是不是会在林彪的问题上不至于走弯路。把林彪说成是接班人，永远健康。话音犹在，怎么他又成了最坏的坏人了？所以李一哲们有了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就突破了那种只给人民民主、不给反动派民主的思想界限。就是说，只要在法律和纪律的界限内，就可以有不同的政治意见。他们的这个思想的直接来源竟然是文革中不同群众派别公开存在、论争的经历，而不是西方民主理论。



第四，李一哲讲到法制，这一点是对整个造反派思想的一个大的突破，是一个飞跃。造反派讲民主而不讲法制，只讲我有意见我要发表，或者我要进行政治活动，不讲遵守法律。李一哲的法制思想是这样产生的：他们看到文化革命前一个阶段群众运动结束以后，新上台的那些领导人无法无天，甚至不像文化革命以前的领导多少还讲一点儿纪律，讲一点儿规矩。文化革命上去的那些新贵，还不如那些旧贵，不如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那些走资派还讲一点规矩，这些新当权者的意志是怎样，就怎么办，打击意见不同的人，打击给他们提过意见的群众，手段非常凶狠。所以，李一哲就感觉到应该有法制。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问过他们，你们的法制思想是从哪来的？他们说当时不是说讲评法批儒，讲法家吗？从法家到法制，你看这个法制观念像西方思想吗？有那么一点，但又不像。所以它真正是从中国的土壤里自己产生出来的想法。

徐：刚才印红标教授介绍的都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过程之中，大家对现实有一定反思以后，对文革的一个反省，所以产生了这种思想。但是印红标教授，我听说这些参加运动的红卫兵造反派，这些年轻学生，他们下乡以后，在广阔的天地里面无拘无束，又开始念书跟思考，也产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思想，事情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思想，他们对中国现实是怎么反思跟考虑的？

印：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是被人们忽视的一个现象。我那本书叫《失踪者的足迹》。我为什么叫“失踪者”呢？来源于上海一位学者朱学勤。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他从城市到农村去以后的一些经历。朱学勤当时年纪比较小，跟着一些中学生毕业生一起到河南的兰考县，就是焦裕禄工作过的那个非常贫困的县去插队。插队以后他们经常讨论一些问题，后来他们又从农村被抽调到一个小地方的工厂里去。我觉得朱学勤描述得很有意思，说这样一些知青，一些工人怎么成天讨论哲学，讨论历史。白天还穿着工作服在那里干活，晚上讨论一些和工人不相干的问题。别人就看着很奇怪，他们是怎么回事？其他工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什么托洛茨基啦、布哈林，这些都离工人的生活很远。朱学勤说他们这些人，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讨论那些本应该由知识分子来讨论的事。或者说这是一个思想的村落，是一个思想的飞地。他感叹后来人们看不到他们了。这些人差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通过高考进了大学，各自有了专业，也很少有人去回忆那段历史，所以他说这些人失踪了。后来我从自己的经历，有感于朱学勤的描述，就去寻找了很多的资料，我看这个时期的青年确实讨论了很多的政治思想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些探讨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甚至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可以对接的。有价值的主要是批判性思潮，不是只跟着官方的宣传，跟着当时左倾错误的中央走的那些说道。

当时有批判意识的思想探索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政策的批判，一个是社会制度的批判。政策批判倾向的人，最开始到农村去，一腔热血努力工作，觉得农民怎么这么落后，怎么这么不积极，后来觉得不是这么简单，恐怕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所以才有一系列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1968年在湖南的新化，有一位知识青年叫萧瑞怡，他给毛泽东上书言事。他是回乡青年，了解农村和农民。他呼吁建立借土借田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政策，但是他不好这么说。而且他还说，要停止人为的阶级斗争。他说现在是人为的阶级斗争，本来那些地主已经接受改造，还要再斗他们，而且还歧视他们的子女，这不是人为地造成很多矛盾吗？他还说搞个人崇拜，到处树毛主席塑像，这是桎梏人们思想、劳民伤财的事情等等。他犹豫再三，把信寄给毛泽东，然后离家在洞庭湖区打工流浪两年。不知道毛泽东看到这封信没有，但是下面的人知道了，通缉捉拿。两年后把他抓到，险些重判。由于他出身贫农，赶上政策有所缓和，法院负责人坚持从宽处理，让他回乡监督改造。一旦回到家乡，人家都知道是自己本村的人，谁还会太为难他。

也有一些出身高级领导干部的知青，比如有一个叫张木生的，就比较早地讨论中国农村问题。他是1965年从北京的人民大学附中毕业以后，到内蒙古临河县去插队，和他一起插队的还有陈伯达的儿子，以及另外一个干部子弟。张木生初中读完了，耐不下性子读高中，就到农村去。其实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央要下面培养接班人。于是让一些干部子弟下基层去，下去以后再培养起来。结果文化大革命把他们这个前途打断了，家长被批判了，当接班人的梦破灭了。他们前途渺茫，就在农村看了很多书，讨论一些问题。张木生提出来人民公社有问题，农村的体制有问题。与朋友讨论农民和农村体制问题，而且还和当时没有下乡的，或刚下乡不久的北京知青进行讨论、辩论。他实际上认为刘少奇、邓小平一些政策主张是不错的。这一部分思潮的人，往往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了批判刘邓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资料，到乡下去以后发现，毛泽东的路线有问题，而被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政策，“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还有彭德怀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有道理。于是把文革的是非观反过来，基本上是这样一条思路。

徐：那照你这么说，除了对文化改革的现实不满意、表示怀疑之外，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有所考虑，而且这种考虑跟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有关系的。他们的考虑不是空想，不光是发泄心中的不满，实际上跟后来改革开放是一脉相承的，也许为它奠定了基础，你觉得是不是起到了一些现实的作用？

印：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说是有两个思潮。政策批判思潮我认为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早期探索，是民间的探索。不是领导人要他们探索的，但是也和领导人有一定联系。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子弟，他们和领导人有关系。刚才我说的张木生。他跟一些造反派的人讨论，造反派在辩论的时候录了音，然后整理出来给中央送上去。送到周恩来那儿，周恩来说年轻人讨论问题嘛，不要当成反革命对待，给压下了。张木生说后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他关起来了，关到监狱去了，关了半年多吧。获释以后，自己还没有放弃思考、讨论这些问题。他有上层关系，当时就见到了在家里赋闲的胡耀邦，跟胡耀邦谈他们的观点，胡耀邦也很有兴致，还说：你们应该继续学习，给他们很大的鼓励。而且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万里把张木生调到中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中央的决策调研。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人，比如说，当时有个大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因为一些思想的问题，对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的分析等等受到批判，叫陈一咨。他大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作为干部，到国家机关或者厂矿工作，但是他希望到农村去，去了河南驻马店。他周围也有些中学生毕业生，他们一起在农村学习探讨，后来这部分中有的进了赵紫阳的智囊班子。这一部分思想和政策的改革是联系在一起的。

徐：那根据你说的情况我就会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中国之所以走向现代化、走向改革开放，全心全意搞现代化，放眼世界，这不光是个别领导的，不光是我们改革的总设计师、英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来的决策，实际上这种民间的思想也有一个很深厚的思想基础。人民群众会根据文化改革的切身体会，思考中国应该怎么变，他们实际上对高层的抉择跟政策的转换，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他们不光只是做一个顺民，按上面指示中国怎么走，上面说对了，他们就跟着走就行了。他们的思考实际上还是会对社会起作用的，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印：我觉得是。具体地说，这样的思潮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最开始有些怀疑，然后就通过学习联系实际，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底层，他们在农村生产队。甚至我们看到习近平和王岐山当时在当知青的时候，也在读人文社会科学的书。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这样过来的。当然每个人考虑的深度不一样，并且在当时的情形下很难进行交流，出格的独立思想交流都是暗中进行的，不能让基层的领导，特别是不能让公安知道。他们是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公开的，但确实是有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1976年四五运动，纪念清明

节，纪念周恩来，很多人对当时中央的政策，对四人帮不满意，对毛泽东也有很大的失望，甚至干脆就是批判意见。这样一个潮流就是和当时社会里面思想活跃的人中间一种广泛的不满议论有直接关系，是一种上下互动，当然也不能把这个上下互动说的太过分。但是总体来讲，这是邓小平进行改革的基础。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派别，沿着另一个思路探讨，我把它叫作社会制度的批判。它的基本的观点就是，由共产党人建立起这个社会稳定以后，原来的革命家集团就变成一个新的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并没有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在民主的基础上成为人民的代表，而是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有了特殊的利益，成了一个新的、高踞人民之上的、具有特殊利益的新的统治阶级。有这种思想的人，一部分是读了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现在翻译成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其实从这个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作者认为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后，领导集团就成为一个新的阶级。这个新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就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地主或者封建贵族、官僚在传统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他们和人民群众是两个阶级，利益上不同。还有一些青年并没有读到德热拉斯的书，但是也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其中有我的同学范东升，当时在内蒙古插队后来到呼和浩特务工。这些人读了一些书，然后就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当时我也参加了通信讨论，所以我知道详细的情况。这些思想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首先认为中国和苏联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生产关系是一样的，中国和苏联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差别，而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别，只是苏联更成熟一点，中国还不太成熟，因此苏联人民和官僚之间的矛盾更尖锐一些，中国还不那么尖锐。再一个观点也是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存在一个新的阶级，在通讯中称作“干部阶级”，主要指高级领导干部。认为干部阶级具有特殊的利益，高踞于人民之上，他们不是人民的代表，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整个社会的主人和主宰。人民要听他们的，而不是他们要向人们负责。第三，因为马克思重视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来自生产关系，因此认为这个干部阶级的基础是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九评》（注：指中共在中苏论战中的第九篇评论文章）里面讲，修正主义从哪里来？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本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残余思想影响，就是说从外国或者历史来的，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之外来的。而这些青年人认为：这个干部阶级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个制度本身。这个制度一天不变，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也就是说领导干部集体成为社会主宰的这种现象就一天不会变。哪里建立这样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制度，哪里就会出这样的阶级。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没有看到实行苏联这种制度的哪个国家免除了这样的一种前途。后来，这些通信被下乡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就受到了批判。这是1972年的事情。与这些青年或者说是我们的观点相似的还有一些。

在1969年，黑龙江有一个清华附中毕业的学生叫许成钢，他也讨论过类似问题。他讲，这种大家批评的、官僚特权的基础应该是这个社会制度。他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研讨，就被别人怀疑上了，被批判了。在这之后，1975年到1976年，云南有一个青年叫陈尔晋，写了一篇《论特权》，后来他把题目改成《论无产阶级民主》，大概写了十二万字吧，详细地做了论述。他认为共产党革命以后，中国和苏联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向着官僚特权的方向发展，要么就通过文化大革命或者其他的革命，不断地来削弱官僚统治。后来我看到托洛斯基也有类似的观点，就是十月革命之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非常有意思。

这种制度批判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西单民主墙上有反映，在1980年北京大学竞选中有反映。后来在1980年，有关出版社专门出版大字本的《新阶级》，字号大、版本大，给领导人看的，为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当中，不全是自由主义思潮，这类批判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思潮强调民主，认为民主是制约官僚集团，保持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制度。这个思潮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没有提出发展私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要求。我把这种思潮归类为民主社会主义，是植根

于中国土地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潮流一直在体制之外，即使在思想解放之后，仍然被加上一顶并不合适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被打压。它与前面所说的政策批判派不同。政策批判派不太看重民主，而更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中没有提到民主。一位下乡之前受过《新阶级》影响的朋友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对我说：我们年轻时主张民主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来邓大人既不搞民主，又引进资本主义，满拧。

徐：但不论怎么说，我有一个感想，就是思想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它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哪怕是思想高度统一的时代，也磨灭不了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独立的思考，对中国未来还是起很大作用的。

印：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这些知青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这种思考没有被功利束缚。不是说我要考多少分，记一个标准答案，他们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甚至可能被说成有反动思想，有政治问题，大学不收。同时没有教授、领导来指导他们。那时候，很多当权派、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隔离起来写检查，干农活儿，他们与父母分开了，父母在牛棚、五七干校，所以是他们自己在思考。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社会实践，他们在农村、在工厂，有一些在部队的基层。他们学习的背景是一个广泛的读书运动，各种各样的书，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应该说，那个时候图书的资源很可怜，就那么一点儿资源。一本书在知青中会传来传去传很长时间。一本书约定第二天要给另外一个村去送，就必须还给人家，而这个村里可能有三四个人想要看，结果每个人就定一个时间，晚上这两个小时给你，另外的人睡觉，到了时间以后，把睡觉的人叫起来，给第二个人看，第三个人看，到时候赶快给人家送去。你要没有信用，下次人家有书就不借给你。很多人的回忆都提到这个。清华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到山西插队的郑光昭，写了一本回忆录讲到当时知青读书的事儿。他说那时候大致上思路是从毛泽东没有发表的一些讲话开始，然后读马克思，再读到德国的古典哲学，还有人读到法国的启蒙思想。因为这是个很艰难的路，到后来就很深奥，很多人没有走得太远。还有一条思路，就是读欧洲社会主义不同思想流派的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译：吉拉斯）的《新阶级》这样一些书，使人感觉到原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教育部颁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读本，还有不同的解释。别的解释也未必没有道理。我说的社会主义不同思潮的这部分书，是在中共和苏共辩论的时候内部出版的，当时中央决定要有计划地翻译不同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供批判。这批书没有装帧，书面是灰色的，后来就被叫作“灰皮书”。这些书本来是给专业工作者，比如专门研究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或者是领导干部看的，文化革命就全都打乱了，图书馆也散了，学生跑到图书馆把书偷出来。或者领导干部被关起来了，他们的孩子就把家里的书拿出来，遇到朋友喜欢看，好，就给朋友看，就这样把书传了出去。于是就产生了一些影响，刚才我说的关于社会的批判跟这个就有一定的关系。

□ 原载：公众号《影响力发现》

~~~~~  
【亲历者言】

毛泽东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浙江的亲信

• 徐景贤 •

（一）

林彪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机毁人亡以后，毛泽东亲自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的亲信——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以及在浙江的亲信——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这次抓捕行动是由南京

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上海的王洪文去北京接受命令，并由王洪文、肖永银副司令和我在上海具体执行的。所以我来介绍一下抓捕的详细情况。

#### ◇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一些政治动向

先说一下我们是怎么知道林彪出逃的。一九七〇年八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对林彪的所作所为打了问号了，但是既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要继续根据党章的规定，维护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和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工作会议。会上，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五员大将的书面检查所作的批示，非常震惊，感到毛的锋芒是隐隐对着林彪的。虽然林彪没有参加“批陈整风”会议，但是紧接着的一九七一年“五一”节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的时候，林彪也随着上了城楼。看来，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并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在暗地对林彪有所怀疑。

一九七一年初，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从机场到招待所的路上，张春桥仔细地观察了上海的街头情况。到了兴国路招待所，他就把我找去，对我说：“我出了机场，车子开到新华路转盘大草坪的地方，看到转盘周围还树着一幅大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里面还有‘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提法，你想法叫人换掉。”他虽然没有明指林彪，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在上海不要再宣传林彪了，特别是再版前言的这种提法不能再公开用了。因为毛泽东一九七零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就反对称“天才”了。我当时不动声色地通知长宁区委，把从机场到市区道路上的标语牌更新，不露痕迹地把四块标语牌一起换掉，换成新的毛主席语录。

另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警卫员、空四军派来的排长小边，在看一本书，我顺便问他：“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他说：“是空四军军部发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的讲话。”

我说：“这我倒没看到过，你给我看看。”我拿来一看，是林立果在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用报告。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已经得知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在空军中是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既然有那么一本书，我又敏感地联想到庐山会议上某些人的活动，所以我就向警卫员小边借这本书。

他有点为难，说：“这书是我们的军内读物。”

我说：“我看看，我也会保密的，不会外传，三天后就还给你。”这书是白色封面，标题印红字，标明是内部文件。我急忙看了一遍，觉得很重要，就给张春桥挂了一个电话，说是有急事要找他。我搞得很秘密，这件事连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也不让知道。到了兴国路招待所，等何秀文把我引进张春桥办公室，自己退出去以后，我才从包里拿出这本书。张春桥一看，很有兴趣，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是空军发的，人手一册，他就把书留下了。过了一天，他很快就把书还给我，当时不加评论，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对林彪宠爱的儿子已作了一番研究。

当时江青等人表面上对林彪仍做出“和为贵”的姿态。一九七一年“八一”建军节前，江青特意给林彪拍了好几张艺术照和生活照。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曾经和王洪

文、王秀珍等人到钓鱼台看望江青，在她的大办公桌上，看到江青拍的一些林彪的半身照。江青的办公桌像打桌球的桌子那样长，桌上放着一些照相册，从这些照片中江青选了一张照片：林彪手捧毛泽东选集，翻开在看，江青给照片取名为“孜孜不倦”，用“峻岭”的笔名将它发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期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试想，林彪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出逃的，八月份全国性的画报还在刊登江青给林彪拍的脱帽照片，林彪是秃顶，脱帽照片相当罕见，所以很引人注目。可见，当时江青等人还想和林彪搞好关系。

一九七一年七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讨论修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八月，周恩来总理和张春桥两人一起到林彪的住地——北戴河去看望林彪，向林彪汇报工作，而且还带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请林彪圈阅以后，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下发。这一切举动，在我看来，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些人主动向林彪表示团结的象征。当然，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等人已经在暗中策划阴谋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到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南巡，找当地党政军领导谈话、吹风，谈到庐山会议有人搞突然袭击，但仍然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毛泽东声称自己回到北京，还要找林彪谈谈，然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这些动作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问题采取的是“冷处理”的方针。

◇ 周恩来通过许世友告诉我们林彪出逃的消息

毛泽东是九月十一日下午离开上海的，临走前，找王洪文和许世友谈话。走的时候，他谁也没通知。有的文章中说，我们已经察觉了有人要谋害毛主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要强调的是，王洪文、我，还有马天水，在毛泽东走了以后，特意到龙华飞机场送许世友回南京，当时王洪文好像松了一口气，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毛泽东和许世友一走，我们感觉到肩上的担子轻松了，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阴谋正在策划、酝酿之中。

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毛泽东摄影画册正式出版的报道。这本画册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报道说：“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我看到这篇报道前，收到过新华社总社摄影部发来的通知，附有这本摄影画册照片的详细目录和文字说明。我知道，这些照片的发表都是经过中央审定的，这是当时中央对外的公开口径。

接着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马上发布禁飞令，所有的飞机停航，包括民航客机在内，还通知陆军部队进驻机场。当时中央没有说什么事情，只是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王洪文和我都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个钟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南京打保密电话给王洪文：“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这样说，王洪文明确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

王洪文说：“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总部，空军司令是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毛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的领会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电话里又不好说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任务完成。许世友是在南京军区打的电话，没想到我们会把南京军区空军作为空四军的上级，这样就差了一级。王洪文按照空军的机制去想，只想到吴法宪为止。我们随便怎样都不可能想到林彪会跑了，听了半天电话说“懂了，懂了”，结果还是没有听懂。

王洪文搁下电话，赶快跑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找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我们两人又仔细地分析，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我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象，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我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这本画册不仅在北京发行，还在上海制版印刷。我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林彪呢？难道他跑了吗？但是在没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们都不敢指名道姓。

飞机停航以后，中央通知军队系统进入一级战备。正好有一个朝鲜高级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搭了一架安东诺夫24型专机飞到上海，下一站要去访问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禁飞令一来，朝鲜代表团走不掉了，怎么对外解释呢？外交部也说不出理由，就说改道走吧。我没有办法，只好让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安排他们改乘火车到韶山去。

## （二）

### ◇ 中央通知王洪文紧急去北京

到了第三天，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马上乘火车去北京。

我们分析：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关系，可能涉及到庐山会议，最好不要让王维国知道。同时，王洪文到北京去这件事要保密，尽量不告诉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我们两人商量，此事只有我一人知道，也由我一人去送他。当时康平路大院的警卫由空四军派来的处长李松亭负责，警卫员也都穿空军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卫员们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会向王维国报告的。王洪文就叫秘书小廖把警卫员支开，然后叫从工厂调来的司机小常开一辆北京吉普，停在他家门口，我和王洪文两人悄悄地坐上车，到当时的北站。

谁知道，我们刚刚进北站，还没登上火车，就碰到市委警卫处的空军干部，他的家属到上海探亲，他到火车站去送行的，这下子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踪。王洪文对我说：“这

样吧，你回去后索性开一个市委常委会议，名义是讨论别的工作，会上你宣布王洪文到上海小三线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布置一级战备，王洪文到小三线检查战备去了。”

送走王洪文，我到康平路开市委常委会，宣布王洪文的去向。王维国也是市委常委，那天他请假不来，说是病了。我估计他肯定从北京空军那里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他一个人究竟在干什么？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空军部队掌握在他手里，我怕有什么变故，就说：“我去看他一次。”

我给王维国打电话，他说：“我身体不大好，正在家里休息。”我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他推辞说你很忙不要来了。我说：“我很快就过来。”我这是第一次到王维国家里，他住在江湾军部大院对面的家属宿舍。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原来在同济大学工作，后来调到空四军后勤部当副部长。一听我要去，杜贵珍就在家门口迎接我，送我到二楼的寝室，王维国躺在床上，见了我，欠着身子，很热情地握手。

王维国四方脸孔、中等身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天他的方脸盘上的倒八字的眉毛比平时皱得更紧，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然也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我问他：“维国同志，你的病情怎么样？”他说：“肝脏不好，正在请中医治疗。吃了几帖中药，还不见好转。医生说我的肝脏里面有毒素，规定我吃中药时要忌口，什么荤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点白粥，解除肝里的毒性。”为了证实他的病，说到这里，杜贵珍就端来一碗白粥给他喝。说了一阵病情后，就把话题转到形势方面。

我说：“九月十三日，中央下达禁飞令，现在中央军委部署全国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级战备命令后，到小三线检查去了。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听到些什么消息？”王维国是河北人，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他说：“没有啊。我们的机场现在给陆军接管了，飞机也停飞了，我打电话问北京空军司令部，根本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很纳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当然，我不能告诉他许世友给我们打电话的情况，我想摸他的底，他当然也想摸我的底，事后才知道他早已经把儿子派到北京去通风报信去了。

我们谈了一阵子，我没有把底交给他，他也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我说：“你好好养病吧。”看起来，他现在还没有什么动作，我就告辞了。

#### ◇ 毛主席下令逮捕“三国四方”

告别王维国，回到市委后，我等着王洪文在北京的消息。我一人在那里演了两天独脚戏，真是度日如年。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办公室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是王洪文的声音，他说：“老徐，你赶快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来一下。”我很奇怪：“啊？你怎么已经回上海了？”他说：“快来，来了再说。”我也感到很吃惊，王洪文回上海，连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进，直奔上海警备区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我赶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大院深处有一幢小楼，过去是陈毅的办公室，现已变成警备区司令部办公楼。

我踏进二楼的司令办公室，看见王洪文神色兴奋，露出很得意的样子，跟我握手的时候，说：“我这次到北京去，许司令也一起去的，这里还有一位肖副司令。”马上向我介绍南京军区副司令肖永银。“我和肖副司令一起从南京赶回上海。”我们坐下后，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我一看，这是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央红头文件，文件的



上方印着：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1971·09·18；中发〔1971〕57号毛主席批示：照发。

我赶紧认真地阅读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读完文件，很震惊，但也很兴奋，连声说：“想不到啊！想不到啊！”王洪文说：“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三国四方’抓起来。许司令与我商量，请肖副司令到上海与我们一起执行这个任务。”

“三国四方”是借用“抗美援朝”时期常用的称呼。“三国”指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四方”是因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两方。

一九七零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召开秘密会议，借用“三国四方”的说法，“三国”是指南京军区空军、上海空四军、浙江空五军。“四方”是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腾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他们于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开过号称“三国四方”的秘密会议，会后根据林立果的旨意，写成了《“五七一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

《纪要》中写道：“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王维国、陈励耘两个人的经历

毛泽东为什么下令要把王维国、陈励耘抓起来？这里要单独介绍一下这两个人的情况。

王维国：一九一九年八月出生，河北元氏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元氏县独立营指导员，游击大队主任。一九四零年参加八路军，历任：一二九师政工队学员，一二九师十一旅教导大队指导员、营教导员，山西晋东独立营副政委、五十四团副政委、团长，太行军分区三十四团政委，中原野战军九纵七十三团团长、政委，豫西军区警卫一团、警卫二旅四团、河南军区警卫一团政委，河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解放后任空军师副政委、政委，空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四军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文革期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六零年晋升为大校、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委。

陈励耘：一九一九年九月生，四川成都人。十七岁在成都就读于天府中学，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三团排长、抗大总校文工团团长。苏中军区抗大九分校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工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团连指导员、营政委，新四军一师政治部秘书。苏浙军区一纵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后方留守政治处主任、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华东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华东军区教导三总队十四团政委，华东军政大学五总队政委，华东军区教导总队副政委。一九五一年任空军航空兵航空师副政委、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空军上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晋升空军大校。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委。陈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一九六四年升任空五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回忆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跟着毛泽东转战南北的年轻将领，一九六九年当上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时都只有五十岁，可是因为他们都被林彪和林立果看中了，受到过林彪的单独接见，又参加过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的“三国四方”会议，会议确定王维国是上海地区的头，陈励耘是浙江地区的头，把他们作为“骨干力量”写进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因此，毛泽东怀疑他们谋反，并且卷入“谋害”的阴谋，就下令立即把他们两人抓起来，并命令这个任务由许世友和王洪文执行。抓捕措施由许世友叫南京军区副司令肖永银随王洪文到上海后具体落实，确定抓捕方案。

### （三）

我们在上海常德路警备司令部办公室作了缜密的研究。肖副司令年近六十，精瘦能干，头发有点白，一看就知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王洪文介绍说他是管作战的，肖副司令首先提议说：“先抓王维国，再抓陈励耘，怎么样？江腾蛟在北京，由北京解决；周建平在南京，由南京解决。至于王维国、陈励耘怎么抓法？我们商量一下。”

王洪文说：“怎么抓，一定要稳妥，不能出事情。最近王维国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刚刚去看过他，他说有病，正躺在家里休息。但是我看他没有什么大病。我告诉他，你到小三线抓战备去了。”

肖副司令说：“我从南京军区保卫部只带了六个人来，这次行动主要靠上海警备区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宜到空四军军部直接抓王维国，他在那里有大量的兵力，很难动。”

王洪文说：“这样吧，今天下午叫他到市委看重要的中央文件，然后抓他。他既然知道我到小三线去了，老徐，还是你打电话给他，比较自然。”我在市委分管意识形态和文教，与军事不搭界，王维国不会怀疑我有什么举动。

我问：“究竟是通知他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呢，还是哪里呢？”

王洪文说：“还是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吧。那个地方环境比较隐蔽，便于埋伏力量。肖副司令，你看怎么样？”

肖副司令说：“好，我叫警备区董副司令安排兵力。我要警备区派一个连，占领延安饭店（南京军区的指挥所）的制高点，同时要动用两个师，控制南京路、淮海路、外滩等主要街道，防止王维国调动空四军进攻。至于锦江饭店那边，我会作全面部署的。”

我说：“那我打电话了，让他下午两点到锦江饭店小礼堂看文件，时间安排来得及吗？”我们大家看看手表，那时是上午十一点，蛮紧张的。

肖副司令说：“抓紧布置，来得及的。”

接着，我们讨论了具体的抓捕方案。锦江饭店是市委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小礼堂有两个门，靠近小花园的前门是平时我们下车进会场的地方。我们让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和我的秘书小张两人守在小礼堂前门，王维国的车来了，就让王维国进小礼堂，但是他的司机、警卫

员不让下车。小礼堂有个后门，靠东边的马路有个通道口，后门边上悄悄地停两辆军用吉普，抓捕到王维国后，就把他架到军用吉普上开走。小礼堂外面和锦江饭店大门口不设任何武装人员，免得引起王维国的随从和警卫员的怀疑。小礼堂里服务员的房间里，埋伏下南京军区的保卫科长等人，等候王洪文向王维国等人宣布了毛主席的命令，可以动手抓捕的时候，埋伏的人就冲出来。董副司令率领一个营的战士埋伏在锦江饭店外围和饭店大门边上的小楼里，严密警戒，以防不测。

部署部队抓人的命令发出后，我当着王洪文和肖永银副司令的面，拿起电话打给江湾空四军军部，直接找王维国。当时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说话的声音尽量显得平静，我说：“维国同志吗？这几天身体好点了吗？今天中央来了一份绝密文件，规定由市委常委阅读，下午我把文件带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去，下午两点请你来看文件，可以吗？”王维国也急于想了解中央的精神，赶忙回答：“可以，可以。”

我说：“那好吧，下午两点，锦江小礼堂见。”就把电话挂上了。我是市委分管宣传文教的书记，王维国根本没有往武装这方面想，对我很放心，他爽快地答应前来。

接下来，我们商量抓捕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的办法。如果单独通知陈励耘到上海来，肯定会引起怀疑，最后决定，还是由我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军政委南萍，通知他今天和省委书记陈励耘一起来上海看中央重要文件，而且说整个华东地区只有一份文件，规定由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上海亲自阅读，要他们立即赶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来。

我和南萍比较熟，他回答我说：“接了电话，叫上陈励耘，尽快出发。”他还告诉我，走海边的一条公路比较近，大概五个小时后到上海。

这样，抓王维国和抓陈励耘在时间上正好错开。两个电话打完后，王洪文和肖副司令认为通知抓捕对象这一方面已经落实，决定兵分两路：肖副司令留在警备区司令部指挥部队，王洪文和我两人赶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抓捕对象直接见面，实施抓捕。

时近中午，我们匆匆吃了点饭，就赶到锦江饭店。这时下午一点还不到，饭店大院里特别沉静。北楼附近马路上有些人在走动，南楼和小礼堂前面的花园里根本没有人影。但是我们知道，周边的小楼上已经隐藏着许多双眼睛，正在注视着小礼堂附近的一举一动。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我们的秘书小张、小廖等候在小礼堂前门，专门迎接王维国，同时安排驾驶员和警卫员留在车上。一切布置就绪。

我和王洪文进入锦江小礼堂。小礼堂有七、八百平米，铺着红地毯，两面都是落地长窗，垂着半透明的绢丝窗帘，礼堂深处有一个供作报告和小型演出的舞台，小礼堂内的桌子、椅子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移动，毛泽东曾在这里多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时候晚上在小礼堂看文艺演出。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曾在这里签订过《中美上海公报》。

今天，我们在动手之前，把小礼堂的桌子、椅子都撤走了，只留下六张沙发，三张沙发向外朝着门口，三张沙发向里朝着舞台，中间的一张是双人沙发，两边各放一张单人沙发，沙发前各放一只茶几，茶几上放了几个玻璃烟缸。两组沙发之间的距离只有两三公尺。王洪文和我坐在面朝门口的双人沙发上，整个小礼堂里就我们两人，静静地等候王维国的到来。

王洪文把文件夹放在茶几上，夹子里放着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一九七一年第五十七号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王洪文点了一支烟，对我说：“毛主席除了下命令对王维国、陈励耘

进行隔离审查外，还谈了今后要抓紧抓好华东地区林彪事件的专案工作。周总理在确切知道林彪机毁人亡以后，在人民大会堂大叫拿酒来，跟中央的其他领导干了好几杯茅台酒。”

因为等人，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临近两点，我们便不再说话，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王洪文指了指茶几上的烟缸说道：“等一下王维国要是拔枪的话，我们就用这东西砸他。”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情格外紧张起来。

#### ◇ 王维国首先束手就擒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二点，王维国的车准时到达锦江小礼堂，我们的秘书把他引进小礼堂的头道门，王洪文和我坐在小礼堂里，面朝着二道门，这是两扇拉门，门上挂着丝绒的门帘。丝绒门帘撩开了，我们看见身穿空军军装的王维国走进来了。他一见王洪文，显得很意外，走上前来一面跟王洪文握手，一面说：“洪文同志，回来啦。”

王洪文说：“是啊，是啊。”顺势请他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这次我不是到小三线去的，我是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因为要保密，所以对外说我到小三线去了。现在我带回来一份中央文件，你先看一下。”说完，王洪文就把文件递给他。

此时，王维国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我以为他要拿什么东西，心里格登了一下，他摸出一个眼镜盒，戴上老花眼镜看文件。礼堂里的空气显得异常紧张，我们两人盯着王维国，看他有什么反映。王维国拿起文件，第一页就看到了林彪在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出逃，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消息。王维国的脸色由黄变灰，两条眉毛紧紧地蹙起来，神色紧张，手拿着这几页薄薄的文件，微微颤抖，看完一遍，还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回过来看第二遍。

王洪文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他：“看好了吧？”王维国说：“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这时候，王洪文很严肃地说：“王维国，现在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你要很好地交代自己的问题。”

王洪文的话音刚落，王维国身后的丝绒门帘又撩开了，悄悄走进三个人，他们是南京军区保卫部李部长等人，他们走到王维国的身后。王洪文宣布完毕，王维国没有显出特别惊慌的神情，好像逮捕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站起来，南京军区的两个干部一边一个抓住他的手臂，另外一个搜他的身，看看有没有武器。他们没有用枪对着他，也没有上手铐，王维国一言不发，任凭他们检查。检查完毕，几个军人用手一夹，推着他朝舞台旁的后门走去。在后门外面的过道马路上，停着军用吉普，他们把王维国往车上一送，军用吉普飞快地把王维国转移到一所事先准备好的地下室，根本没有惊动小礼堂前面的人。王维国的司机和警卫员还在那里说说笑笑，等了很久，才被安排走。

王维国的问题解决了，王洪文和我两人都松了口气，这时候，掉过头来再给浙江省委打电话，问他们出来没有。省委办公厅说，南萍、陈励耘早在中午十二点多就乘小轿车从浙江杭州出发，估计五点多钟可以到上海。

在等候的过程中，下午三、四点钟，王秀珍来了，原来她是到锦江饭店北楼接待外宾的，一看王洪文和我的车都在，就找到小礼堂。因为她也是市委书记之一，王洪文就告诉她到北京去的情况，同时给她看了中央文件，王洪文还对她说：“我们已经把王维国抓起来了。等一下还要抓陈励耘。”

她一听，非常好奇，又很紧张，说：“我留下来看看，好吗？”王洪文跟她关系比较近，说：“好吧，好吧，你就留着吧。”这样，在小礼堂里等候陈励耘的就变成三个人了。

#### （四）

◇ 陈励耘的车掉到海里去了

我们在小礼堂里一面聊天一面等人，等到傍晚六点钟，还不见杭州的车来。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或是抓王维国的消息捅到杭州去了？我们要秘书一再打电话给浙江省委，那边回话说也没有任何消息。王洪文担心出事情，就叫市委警卫处派人开车沿着沪杭公路去找。一直等啊等，等到晚上七点钟，只听外面嚷起来，“来啦！来啦！”

门帘撩开，走在前面的是瘦瘦的穿陆军服装的南萍，后面则是高头大马的穿空军服装的陈励耘。陈励耘走进来，一面跟我们握手，一面大叫：“今天倒了霉了，车掉到海里了！”只见他提着蓝色的裤管，裤腿上沾着泥浆水，还水淋淋地往下滴着。

南萍是二十军政委，又是浙江省的一把手，说话文绉绉的，忙着给我们解释：“我们想赶路，车开得太快，从杭州到上海的沿海公路，有一处地方是急转弯，路旁有标志，但司机没有看清楚，没打急转弯，车子就开到海边的泥塘里去了。”

陈励耘说：“今天真是不顺利，欲速则不达！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从泥浆里爬出来，让农民来拖车。拖了半天也拖不上来。又跑到公社去，派出几辆拖拉机才把汽车拖上来。”

王洪文说：“怪不得，多等了你们两个钟点。请坐，请坐。”两人就在对面的大沙发上坐下。

陈励耘不但长得高，皮肤也黑，我们平时开玩笑地说，他就像京剧《沙家浜》的唱词里所唱的那样：“像座黑铁塔”。他走起路来两条腿叉开，一摇一摆，颇像一头企鹅。他是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文化水平比较高，在中央开会时做纪录很详细。每次中央开会，上海由我作记录，浙江由他作记录，南萍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两人的纪录在南京军区算是比较好的。当时，中央开会，要详细记下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有三份纪录是比较好的，一份是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记的，一份是浙江省他们两人的记录，一份是上海我的记录。凡是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纪录完后总是互相核对，核对出一份标准纪录，再带回去传达。

当时在陈励耘任政委的空五军有几个笑话流传，而且流传很广。有一次，林彪给浙江空五军送了一筐桔子，林彪经常会给比较亲近的部队送礼物。军部机关领导特地召开誓师大会，庆祝林副主席送来了“幸福果”，然后把这一筐桔子一层一层地分送下去，军到师，师到团、营、连，层层开会表忠心。有一个师的政治部，分到一个桔子后，由政治部主任召开誓师大会，正好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去了，没有参加大会。大会结束后，政治部主任把分到的那个桔子恭恭敬敬地捧回来放在桌子上，他还要考虑这么大的机构，下面人那么多，这个“幸福果”怎么吃法？还没有考虑出一个办法，他临时有事离开了办公室。

正好这个时候，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回来了，他又累又渴，看到政治部主任桌上的桔子很大很解渴，拿来剥开三口两口就吃光了，把桔皮扔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政治部主任回来，一看“幸福果”没有了，大吃一惊：原来进了副主任的肚子！这下主任叫苦不迭：“刚刚开过誓师大会，你吃掉的是接班人林副主席送来的重要礼物，闯大祸了！”难道再开一个大会作吃掉了桔子的检讨吗？副主任也紧张了，这下真倒霉了，可能还要撤职呢。正发愁时，主任一看桔皮还在，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赶紧叫伙房把桔皮泡在大缸里，烧了一大

缸桔皮茶，里面多放几斤白糖，让全体干部战士都来喝上一杯“幸福果”茶，这样，总算让大家尝到了副统帅送的礼物的滋味，也给副主任解了围。不过，最后副主任还是认真地写了检讨。

为这件事，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活龙活现地作了描写和讽刺：“副主任独吞幸福果，政治部分享桔子皮。”横批是“嘴馋遭祸殃”。这个和陈励耘有关的空五军的笑话流传很广。

还有一个笑话，也是关于送礼的。林彪给浙江部队送了一盒他湖北家乡的土特产——麻片糕。也是同样的问题，僧多粥少。分到麻片糕的军事单位，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围桌而坐，把麻片糕掰成一小块一小块，保证每人有一小片。记得当时有一部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里，著名演员邦达尔丘克演的苏军俘虏，到德军司令部去得到一个白脱面包，回到俘虏营后几百个俘虏看到一个面包，嘴馋得不得了，也是大家围坐着，把面包分成很小很小的一块块，分而食之。但现在部队面对林彪的礼物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表忠心。所以大家在吃麻片糕时，还有一套很繁复的程序，一面吃糕，一面发言，轮流表态：“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广大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鼓励、最大鞭策！”等等等等。

此刻，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陈励耘和南萍坐在沙发上，显得很累。陈励耘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腿伸直了。王洪文对他们讲了最近到北京去开会的事，特别提到有份中央文件带了回来，说着他把中央文件递给南萍，南萍在看的时候，陈励耘把头也凑过去，两人合看一份文件。突然，陈励耘拿烟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手指夹着香烟的烟灰烧得很长都不察觉。文件的内容，对他来说确实是惊人的消息。等他们看完文件，还未吭声，王洪文就宣布：“陈励耘，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现在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与此同时，南京军区的几个干部也走到他身后。陈励耘有个特别的动作，当他听到毛主席的命令，就把两只手举起来，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神态非常沮丧，站起来就随着南京军区的干部从小礼堂后门走了。

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抓捕陈励耘后，已是晚上八点多了。王洪文请南萍到锦江饭店北楼吃饭，我和王秀珍两人作陪。王洪文告诉南萍：“这次我们接到命令抓王维国和陈励耘，你要把浙江的工作稳定下来，至于空五军的工作，叫白军长主持。”正在说话的时候，警备区董副司令来报告说：“王维国和陈励耘两人已被安全押离上海，送到南京军区在一座山里开挖的坑道里的地下室，看押起来。为了安全起见，一路上给他们头上盖了一条军毯。到了目的地，给他们吃了晚饭，王维国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肉丝菜汤面。”

#### ◇ 王维国、陈励耘的最后命运

在王维国、陈励耘被抓捕的同时，“三国四方”的其它几个人，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在南京被抓捕，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在北京被抓捕。这样，参加过上海“三国四方”会议的几个人全部落网。九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由周恩来亲自出面，对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四人实行抓捕，把他们关押于北京卫戍区驻顺义的部队里。毛泽东接着又下达了一道命令：全国的林彪专案由周恩来总负责，华东地区的林彪专案由许世友、王洪文负责。这以后，一场全国范围的批林整风运动以及清查林彪余党的工作就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

至于王维国和陈励耘两个人的最后命运，取决于一九八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的判决。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王维国在被关押了十多年以后，军事法庭认为：王维国积极参与林彪集团策动武装叛乱的犯罪活动，参与林立果指挥的“上海小组”，并根据林立

果的旨意组建“教导队”等武装和试制七·六二毫米轻型冲锋枪，积极为林彪策动武装政变服务，参加《“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上海召开的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秘密会议，并被林立果指定为上海的“头”。在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后，积极参与策划在上海谋杀毛泽东的活动；谋杀计划失败后，又将毛泽东在上海的谈话内容和离开上海的情况密报周宇驰，促使林彪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据此，王维国在一九七八年四月被开除党籍，一九八二年二月被开除军籍，一九八二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刑满释放，让他回到他妻子杜贵珍的原籍河南省安置，一九九三年病故。

陈励耘的处理比王维国稍轻一些，先后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进过秦城监狱，一九八二年三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免于起诉，一九八二年五月按一般干部退出现役。给陈励耘的免于起诉书内容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于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0号

被告人陈励耘，男，现年63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1971年9月20日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陈励耘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6月13日移送本院，提请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陈励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指挥班子”的“实施要点”，召集《纪要》中确定的指挥班子成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四军政委王维国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开会。会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于新野专程去杭州接陈励耘。陈在于新野陪同下，于3月31日晚赶到上海参加了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陈励耘为杭州的“头”，陈励耘接受了委派。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

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免于起诉”的陈励耘已被关押了十年有余，获释以后，他被安置在浙江嘉善，与他的老伴共度晚年。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十五章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